



雕版印刷术始于东汉说

南京大学 吴式超

对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国雕版印刷术，究竟始于什么时候？这个问题虽经中外学者长期研究，先后提出了汉代说、隋代说、唐代说、五代说等论点，而始终未有定论。目前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在唐代。张秀明先生在《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》一书中，进一步具体假定在唐太宗贞观十年（636）前后。其所根据的是明代史学家邵经邦（1491—1565）所著《弘简录》卷46的一段记载。该文说，唐太宗皇后长孙氏崩逝，太宗很悲痛，左右献上皇后所撰《女则》，“帝览而嘉叹，以后此书足垂后代，令梓行之。”“梓行”就是雕版印行，意思很明确。但由于未找到邵经邦说“梓行”的依据，只能作为“假定”。我们认为，即使邵经邦言出有据，亦不能证明雕版术即发明于初唐。由于张先生是国内研究印刷史有影响的专家，他的意见受到普遍的重视。近年出版的书籍，讲到印刷术起源的，都把发明时间定于初唐，或笼统的说在7—8世纪之间。钱存训博士为张秀明先生即将出版的新作《中国印刷史》写的序言中，也提到“譬如印刷术的发明年代问题，众说纷纭，主要是根据文献中一二字的推敲。本书作者推定在7世纪中叶唐贞观时，是相当合理的，但至今还没有这一时期比较详细的记载和印本可供互证。”^①钱先生的意思认为初唐说还不够很踏实，缺少记载和印品实物作证据。我们认为，在解开印刷术始于何时之谜时，不能仅仅从文献记载与印品实物着眼，还应从科技发展水平及与印刷术有关的其他考古发现中，寻找根据，综合考察。因为既存在文献根本未予记载的可能性，又存在最早的印刷品根本没有流传下来的可能性。

最早提出雕版印刷术始于汉代的，是清末人郑机。郑机著《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》卷12中曾说：“汉刊章捕张俭等，是印板不始于五代。”郑机此说，是根据《后汉书》的记载。《后汉书·张俭传》载，张俭上书弹劾当时极有权势的宦官侯览的罪恶，得罪侯览，被览等诬告，朝廷“于是刊章讨捕。”《后汉书·孔融传》中，也记载“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，览为刊章下州郡，以名捕俭。”元代王幼学著《纲目集览》卷12解释“刊章”是“印行之文，如今板榜。”就是说，通缉张俭的文字，是刻印出来的。郑机虽提出印刷术发明于汉代说，但未提出进一步证明，故后人多持怀疑态度。刘国钧先生认为：“不无道理”，“尚感条件不足”，当时的纸是否能用来印刷？“还缺乏更确切的文献记载和实物予以证明”。^②张秀明先生也对当时的纸是否能用作印刷，表示怀疑。他说：“单凭元朝人间接的解释，很难使人信服。假使二世纪真有印刷术，为什么对以后四五百年再也不发生一点影响呢？这显然是不合理的。”

为了回答上述疑案，让我们具体考察一下，发生“刊章讨捕”事时的东汉末年，是否具备了发明雕版印刷术的技术条件。雕版印刷的技术，其实是很简单的。它只需具备^①掌握雕刻阳文反字的技术，^②需有墨和纸。我国在先秦时就已懂得刻阳文反字印出正字的道理，也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。在考古发掘中，曾出土大量的战国及秦代陶文，其中很多是用阳文反字的戳印盖上去的。远在东周之时，已能制作墨，《庄子》中有“宋元君将画图，众史皆至，受辑而立，舐笔和墨。”出土的数万枚简牍，皆墨书。纸是应用印刷术的关键。在蔡伦对纸进行改进之前，纸已能作书写之用。据《后汉书·贾逵传》载，汉章帝（公元75—87）

曾令贾逵选优才生教授《左传》，赐逵“简纸经传各一通”。又，《后汉书·和熹邓皇后传》载，邓志在文史，自永元十四年（102年）立为皇后，下令禁止各地进贡珍丽，“岁时但贡纸墨而已”，说明已有不少地方能生产纸墨。在邓皇后的倡导之下，蔡伦在领导宫廷作坊造纸时，着意改进，造出佳纸，于公元105年献给皇帝，受到称赞，纸“自是莫不从用焉。”汉末东莱有善造纸者，名左伯字子邑，他造的纸达到“研妙辉光”的程度④。如此好纸，难道还不能用作印刷吗？一般来说，能写字的纸也就能用于印刷，因雕版印刷用的也是水墨，与写字用的墨，并无差异。

当然，具备产生印刷术的条件并不等于发明了印刷术。考古实物表明，东汉的时候，人们已经懂得用雕版的方法复制图象。论证印刷术始于初唐的文章，大都引用《云仙散录》中的一句话：“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，施于四方，每岁五驮无余。”作为重要的佐证。孰不知刻木印象，在西汉就大量存在。目前已出土的汉代画像砖，数以十万计。这些画像砖，就是刻木印制出来的。据考证：“画像砖是用刻有画像的木范，压印在半干的土坯上，再入窑烧成的。”⑤“所有画像砖的画面，均为模制。往往在不同的墓葬中发现同模的画像砖”，⑥“如讲学画像砖，有一块出土于青杠包第3号墓，另一出于山羊子山第2号墓，模完全相同。”⑦“在羊子山第10号墓出土的一块双阙砖上，当画面印上后，有狗踏上的足迹，且迹痕甚深，可见当画面印上时，砖泥尚是很软的。”⑧“出土的画像砖，画面内容非常丰富，刻工精致细腻，达到很高水平。如果不是印在泥上，而是印在纸上，岂不就是印刷品吗？”

我国刻字印制短文的历史，可以上溯到东周之世。现存台湾的青铜器秦公敦上的铭文，就是实物见证。该器共103字，是每字刻一印，依次印在土范上，再铸到器上的。从拓片上看，每字都有独立的方格，印痕明显。罗振玉在《秦公敦跋》中说：“今此敦之文则每字为一范，合多范而成文。”秦始皇时又出现一个例证。现存秦陶量上，印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，共40字。该诏书就是每四字制成一个方印，依次盖上去的。侯览讨捕张俭的文书，字数不会很长，约10至20字，刻于木板印盖在纸上，是有可能的。

关于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史料，至今没有发现像沈括记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那样确切的专门记载。只有在讲别的事时，顺带提及的“刊章”、“梓行”等片言只语。故刘、张、钱三位先生都深感于文献无征。这是因为古代贱视百工技艺之故，像秦公敦、秦量上用刻字印短文的方法，就不见文献记载。如不是实物出场作证，恐怕今人也不敢轻信。

既然东汉就出现了印刷术，为什么其后四五百年之间，没有得到推广和应用呢？我想，这是因为掌握雕版印刷技能的是工匠，他们没有文化，不可能产生刻印图书的想法。而有一笔一划抄写之苦的士人，又不了解工匠的技能，致使先进技术，未能得到应用。再者，当时社会上对图书的需求量很少，从经济角度看，不存在雕印图书牟利的动力。直到佛教大兴，佛教徒为了消灾求福，须大量抄写经咒，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，自己不会抄写，需雇人抄或买取。社会上对佛教经典和符咒的需求量非常之大，抄写已经供不应求。这时，印行经咒成为有利可图的事。于是，雕版印刷术就在这里首先得到了推广应用。

注：①该文刊于《文献》1937年第2期；②见刘国钧著、郑如斯补订《中国书史简编》第55页；③见张秀明著《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》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，第28页；④见钱存训著《中国古代书史》第131页；⑤⑥见刘志远等著《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》第2页；⑦⑧冯汉骥著《四川的画像砖墓及画像砖》，刊于《文物》1961年第11期。